

●残阳如血——晚清涉外人物系列●

在中西对峙的情境中,曾纪泽通过自身敏锐的观察和收复伊犁的谈判,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西方观念,同时,也从国外的角度反观中国,得出了“中国睡狮已醒”的惊人结论。

曾纪泽 始信昆仑别有山

本刊资料



曾纪泽(1839年~1890年),湖南湘乡人。曾国藩长子。1878年为驻英法公使。1880年又奉派兼任驻俄公使,与俄国谈判改订崇厚与俄国擅订的《里瓦几亚条约》,经反复交涉,于1881年签订中俄《伊犁条约》(又称《中俄改订条约》),收回伊犁和特克斯河地区。中法战争时力主抵抗,反对言和。1884年初反对李鸿章与法国签订《中法会议简明条款》,被免去兼驻法国公使职。同年晋升兵部右侍郎,与英国议定《洋药税厘并征条约》。1885年,清廷召其回京供职。1886年帮办海军事务,旋为兵部左侍郎,命在总理衙门上行走。

李扬帆

大清第一任驻英法公使郭嵩焘,由于受到当朝守旧派的攻讦,在任不到两年时间就黯然辞职了。他的继承者是他年轻21岁的晚辈曾纪泽。

曾纪泽30岁以前,一直孜孜不倦地吸收父亲曾国藩的立德、立功、立言的教诲并苦学英文,为出使欧洲奠定了坚实的学识和处世基础。在中西对峙的情境中,曾纪泽通过自身敏锐的观察和收复伊犁的谈判,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西方观念,同时,也从国外的角度反观中国,得出了“中国睡狮已醒”的惊人结论。

三个层次察欧洲

洋务运动的启蒙者们如曾国

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在最初与西方的交往中,感应到变局的到来,但是否真的认识到中国与西方的差距,则是有疑问的。要承认中国在军事力量不足之外,还承认经济和政治体制等文化范畴的不足,这对这些传统的士大夫而言,实在是难以逾越的心理障碍。毕竟,只有亲身经历了西方社会的生活,才能真正有力地冲击这最后的心理防线。曾纪泽的前任郭嵩焘已经大胆地承认了中国文化问题对中国发展的深刻牵制,曾纪泽本人也通过朴素的观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初到欧洲,曾纪泽以诗明志:“九万扶摇吹海水,三千世界启天关;从知混沌犹馀言,始信昆仑别有山。”曾纪泽对于昆仑之外的这座大山,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观察,具有很强的层次性:

一是对中西方文化的基本认识。他从小学教育入手,认为“中华所谓小学,有古今之分。汉学家以文字、声音、训诂为初学津梁,古小学也。宋学家以洒扫、应对进退为童蒙基址,今小学也”。而“西人所谓小学,则以显微镜察验纤细么么之物,以助格致家考究万物材质凝动之分、生死之异、动植之类、胎卵湿化之所以别。由细而知巨,由表以验里,由无用以求有用,由同种以察异种。以此为小学,与光学、电学之属,争奇而并重,设公会邀人观览,亦集思广益之意也”。以此论之,他认为,中国的学问注重人的道德文章,关注主体的修行,而西学则注重对客观事务的具体考察。

对西方文化的这种认识,直接渗透到曾纪泽办理外交的实践中去。曾纪泽发现西方国际关系遵循一种规则即国际法,而国际法的根本点在于保护国家主权,保护国家主权还不论国家大小强弱。他说:“西洋各国以公法自相维制,保全小国附庸,俾皆有自主之权。”并认为,这是西方和东方在文化意义上的最大不同。国际法意识和主权意识给了曾纪泽无穷的力量,他利用西方国际法作为武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当崇厚在朝廷并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同俄签订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时,朝廷大怒,派曾纪泽出使俄国,同俄国人交涉。曾纪泽就是坚持国家领土主权不可退让的原则,虎口夺食,成功地收回了伊犁。他在辩论《烟台条

约》洋药加税时，义正辞严地说：“西洋各国，无论大小、强弱，其于税饷之政，皆由主人自定，颁示海关，一律遵照办理。客虽强而大，不能侵夺主国自主之权”，“加税之权，操之在我！”

二是对西方社会的体验和认识。在学问之外，纷繁复杂、热气腾腾的西方社会给曾纪泽以何种冲击呢？对于外交官，考察所在国“政事语言文字风俗之不同”是一项基本的使命。曾纪泽在日记中主要记载的就是这方面的观察结论。首先看建筑。中国建筑多平面摊开，楼层不高，浪费土地。而“西人地基价值极昂，故好楼居，高者达八九层，又穴地一二层为厨室、酒房之属，可谓爱惜地面矣”。形成这种差别的根本原因，曾纪泽没有进一步剖析。其实这种差别是中国和西方在发展阶段上的差别所致。中国城市没有充分发展，因为处于农业文明的阶段，而西方城市和工商业的快速发展，必然导致地价上涨和高楼大厦。对于园林建设，曾纪泽也注意到中西差别。西方“其建筑苑圃园林园，则规模务为广远，局势务求空旷。游观燕息之所，大者周十馀里，小者亦周二三里，无几微爱惜地面之心，无丝毫苟简迁就之规。与民同乐，则民不怨”。这样的结论很有见地：他把西方建设公共园林和“与民同乐”的政治理想相结合，发现了西方社会以民为本的政治基因。其暗含的意思，则是中国园林多为私家或皇家所建，没有实践古人“与民同乐”的理想。

三是对军事力量的认识。作为洋务运动的热心支持者，他对中西方军事力量的差距，应该说是最为敏感的。对于西方军事力量的强大根源，他认识到：“盖其规模，亦合通国人士之智力，积数十年之历练，耗无数之财赋而后成焉。故闳博精微，兼擅其胜也。”西方为什么

能够做到利用全国智慧和力量，而造就如此庞大的军事机器呢？曾纪泽语焉不详。这可能是他观察的缺陷，但也可能是他不愿牵涉进政治的纠纷吧。因为他反观中国自身的著名文章《中国先睡后醒论》中说“至于国内政事”，则云“余暂不言”。毕竟，走下去就是维新派了。这是他的局限性。

中国先睡后醒论

“仓卒珠盘玉敦间，待凭口舌巩河山”，这是曾纪泽在出使俄国前写给其前任邵友濂的诗文，衷心表达了他捍卫领土的决心。如果说这种心情在朝野激情共愤时尚能起到作用，但当遇到朝廷决意妥协的时候，苦心孤诣的曾纪泽就只有“一腔愤血，何处可洒”的份儿了。中法战争打响后，力主抗战的曾纪泽被清廷视为与法言和的障碍。1884年4月，清廷下谕，免掉其驻法大臣的兼职。次年又免去其驻英大臣一职。但在临走伦敦之前，他和英国人马格里合作，用英文写成《中国之睡与醒》(China-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发表在《亚细亚季刊》上。随后又以《中国先睡后醒论》为名发表在香港的一个中文刊物上。此文表达了曾纪泽充满着强烈自强气息的中国观念。此后，中国“睡狮”论便不胫而走，成为百年中国寻求自强的经典比喻。

曾纪泽在文章中表达了这样的认识：首先，他认为西方是把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的。“关于包括在条约口岸里的外国租界内以及包括在其他方面的那一部分领土上的主权的让与，中国觉得那些条约是把一种情况强加在她的身上的，这种情况将要迫使她在今后十年期限告终的时候废弃那些条约，借以避免它们已经在别的国家里引起的那些罪恶”。

其次，他认为，外来的侵略是

足以“唤醒中国于安乐好梦之中”，中国的“全备稳固可翘足以待”，对民族振兴满怀信心。曾纪泽认为，百年以来，中华帝国对外闭关自守，对内安于粉饰，上不通，下言塞，日益衰退。鸦片战争惊醒了天朝迷梦，有识之士知耻而后勇，学习西方，求强求富，至今日已初具规模。“中国今日用其全力，整顿海防，使铁舰坚固，战船得力也”。“中国现将卫固海疆，水路军务逐渐推广，以目前论，铁路等事，凡可以富国利民者，在所应为，然尚可期诸异日也”。同时，外务邦交也应一一妥当处理，“今拟于十年重定之期，更张厘正，全国体也”。机器、矿业、铁路等行业，“中国皆有意为之也”。基于此上种种依据，曾纪泽得出“中国真醒大醒”，“无复有睡之意矣”。

对于曾纪泽的乐观断定，当时著名的香港维新派人士何启对此提出疑义，认为他的论点太过乐观，是把中国没有发生的事情当成了真实的事实，所以才得出“中国已经睡醒”的结论。

这样的争论当然值得从现实和政治观念的取向上进行解读，但是，曾纪泽所要真正表达的，是一种拳拳的爱国之心，是一种自强的信念。他的中国观念是建设性的，具有积极的价值。曾纪泽在国外余暇时间曾“作乐章一首，兼排宫商，以为国调(国歌)”，并为自己所作的国歌起名为“华祝歌”，足见祖国在其心中的分量。

不过，曾纪泽的睡狮论虽然表达了一种积极的愿望，也在一定程度上舒缓了他那一代士大夫对中国落后而不得其法的心理压力，但是，他提出的命题却需要人们作进一步的严肃思考：如果中国没有睡醒，那么是什么使她酣睡？如果正在醒来，那么促使她醒来的方法是否是根本之计呢？